

1601

巩义市文史资料

第十九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巩义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九七年九月十日

巩义市文史资料

第十九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巩义市委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九七年九月十日

目 录

忆法学家王桂五	张 虚(1)
怀念皮徐支队政委——徐子荣	张 虚(22)
程子川	邵成森(29)
争取程子川	邵成森(31)
由开明士绅到抗日副区长的李景春	于道坤(34)
南官庄谈判	邵成森(37)
三擒康文汉	邵成森(42)
回忆巩县七里铺的扩军	王志明(46)
解放初期的“支前、拥军、优属”工作之片断	焦庭才(48)
记县中的抗日宣传活动	武磐石(52)
为巩县抗日县政府刻印的薄敬恩	刘年成(54)
巩县回郭镇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	邵成森(56)
巩县回郭镇卷烟工业的发展与变革	张守训(78)
先父陈灼三和河南船商公会	陈浴春(85)
清末民初巩县煤矿工人生活见闻	魏树人(92)
河南煤矿工人状况	摘自《民国日报》(95)
解放前目睹的两党军队	张国瑞(96)
建国前的两次倒地政策	张荣贤(101)
我所经历的倒地运动	李 江(104)
巩县干部业余文化学校回忆片断	王文正(108)
我所主办的巩县邮电局“工人之家”	武磐石(112)
刘延涛思乡诗十二首	张茂军整理(123)

日本侵略军飞机轰炸仓西小学纪实·····	武磐石(130)
日伪军袭击石榴院纪实·····	张荣贤(133)
王全三所属特务队罪恶事实片断·····	张荣贤(138)
天仙庙道仁义社会首张保山·····	张荣贤(141)
解放前小麦的收打方式·····	张国瑞(143)
巩义市气象谚语二则·····	刘延德口述 崔振普整理(148)
一组各阶层生活写实·····	张荣贤(150)
一张旧名片(旧社会官场风气一瞥)·····	张荣贤(154)
医德高尚医术超群的外科中医马旦先生·····	张荣贤(156)
滴水贵如油·····	李 江(159)
援邪归正碑·····	李 江(161)
乡土地名谈丛·····	旭庵口述 于锡琮代笔(163)
宓妃庙·····	刘延昌供稿(166)
巩县忠烈祠·····	崔南星(169)

补白:

谒杜甫故里·····	叶嘉莹(28)
忆皮定均将军·····	王桂五(36)
南宋理学家真德秀的《戒贪诗》·····	任崇岳辑(41)
魂兮归来·····	王桂五(45)
宋太宗赵光义的《戒石铭》·····	任崇岳辑(53)
杜甫故里·····	石川忠久(55)
重谒邙少陵墓·····	萧涤非(100)
角端·····	(140)
读史·····	毛泽东(162)
试谈黄帝修坛沉璧距今的年代·····	(168)

忆法学家王桂五

张 虚

中岳嵩山北麓的白云山下，有一个叫“侯地”的村落。相传因舜帝的大臣伯益侯安葬于此而得名。（又传说因太室九山中的小白龙变为白云及时降雨，驱赶旱魔，为商汤王嘉奖，故将九山封为白云山。）随着人口繁衍增多，“侯地村”便分为“东、西、南、北侯”四个村。已故的原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主任、著名法学家王桂五同志（号香山），1918年就出生在这个豫西贫瘠的北侯村。这一带美好善良的传说，将永远伴随着嵩洛人民对王桂五同志的怀念。

（一）地下斗争

王桂五同志是中共巩县县委在地下成立时的第一任书记。在地下斗争中，他发展了党组织，团结各阶层抗日群众，有效地开展了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争 夺 阵 地

民国初年，科举制度在山村的影响还很深。当地的士绅举荐一位吃过“助学皇粮”的廪膳生员，在白云山下，西村村外的五岳庙，以庙产为主开办了一所学校，起名“秉礼”。办学宗旨可能是为培养能够掌握封建礼法的后人。

秉礼学校成立不久，军阀混战，兵灾匪患骚扰豫西，五岳庙的“山神爷”保不住学生的命，有个学生被害。学校只好搬

进村子。

1937年，王桂五同志在洛阳师范毕业后，回到家乡应聘进秉礼学校任教。在这之前，随着时局激变，秉礼学校不少师生的思想境界已逐渐发生质的变化。一批思想进步的青年高举抗日救国、反对封建压迫的“礼”，给“秉礼”赋予全新的含义。1938年春，校长赵建宇和王桂五在这里面对自制的红五角星，由张正兴同志监督，庄严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3月间，他们在年岁较大的学生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到了6月，巩县第一个中共地下党支部就在秉礼学校成立了，王桂五担任第一届党支部书记。从此，秉礼学校成了巩县地下党的基地。

党在秉礼学校的地下活动，引起国民党巩县县党部的注意，个别有反动背景的教师也跃跃欲试，企图夺取党在学校的领导权。桂五同志便领导进步师生揭露他们散布的失败主义言论，指出这是患了“恐日症”，结果他们的图谋不但没有得逞，反而灰溜溜地扛铺盖走人了。但是斗争并未因此停息，为了减少国民党当局对学校的压力，桂五同志于1938年寒假主动离开该校，保住了共产党员赵建宇同志的校长职位，也保住了党在秉礼学校这块阵地。

供给爱国精神食粮

1939年1月，中共巩县地下县委成立，桂五同志任县委书记，可成立县委的会议，他却没能参加，不过他并不觉得遗憾，因为他那时正在河南浉池县。不是因那里众多的历史传说引发了他的怀古雅趣，而是他有幸被组织选派到驻浉池的八路军兵站学习，并亲耳聆听了刘少奇同志关于共产党修养的首次报告。

从浉池学习回来以后，桂五同志连续数次主持召开县委会，传达少奇同志（当时称胡服）的报告和省委的工作部署。为了

安全，每开一次会，都要换一个地方。一次，县委在一位党的同情者家中借地方开会，会外发生了一段有趣的插曲。这位同情者非常关注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问题，酷爱读书，但不知如何用以解释历史和现实。在接待、掩护与会同志的工作之余，他和桂五同志探讨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社会性质，并坚持认为1840年以前中国就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了，根据是《汉书》的《食货志》。这就引发了县委书记和地委领导与他的热烈辩论。从此县委更加重视对进步青年读书活动的引导工作。可以说是供给爱国的精神食粮。这段插曲，事隔半个多世纪重提，反而比当时会上的议题还有意义。它反映当时党内党外广大青年，关心政治勤奋学习的进取精神是很普遍的，这正是我党团结引导青年进步的正确途径。事实上不少青年都是通过我党倡导的读书活动，阅读进步报刊，由读书会接触党的外围组织而走向革命的。豫西地区土窑洞很多，窑洞上边还有窑洞，俗称天窑，多数没有阶梯，往往是借用活动悬梯或攀援野生灌木而上，本是为了逃避匪患的。此时，则成了年轻人阅读《新华日报》、《大众哲学》、《西行漫记》、《解放杂志》、《社会科学概论》等书刊的地下堡垒。巩县的地下党，也就是在这种健康、清新的氛围中以进步青年学生为主，发展起来的。

坚持党的统战方针

国民党酝酿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期间，巩县的政治空气也很紧张。当时王桂五在巩县二小任教。这个学校的校址是清末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皇太后携光绪皇帝出逃陕西，签定了卖国条约班师回京时，路经巩县稍事休息的“行宫”。面临洛河，背靠黑石山，依山傍水，景色秀丽且地形险要。有天深夜，忽闻急剧的敲打校门声，校长立即让王桂五往学校后面的山上跑，

然后自己应声缓缓前往开校门。这是校长与桂五早已订下的“金蝉脱壳”对策。等校长开了门，不禁噗哧笑了，原来是学校女教师的丈夫，虽然只是虚惊一场，但足见王桂五同志已经在教育界打下了党的统战工作基础。

党在地下，不搞好统战工作是很难立足的。早在1938年巩县建党之初，王桂五就抓住当时巩县第二区的区长贪污群众上交军马费这一热点问题，联合当地的士绅和联保主任，亲自到郑州调查那个区长购买骡马的贪污行为，经过控告，赶走了贪污区长，减轻了群众的负担，提高了他在当地的威望，为日后在政界、教育界开展上层统战工作打下了基础。当年他刚满20岁就有如此的胆魄，难怪后来连《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论共产党员修养》这类书都能经他手寄到巩县上层人物手里，连巩县教育局的督学都主动为他打“马虎眼”哩！王桂五兼任北侯村初小校长时，由于我党的党员教师在学生中进行革命教育，年龄大一点的学生都知道共产党和红军。有一次教育局的督学去视察，在课堂上问学生：“现在打仗什么军队最勇敢？”孩子们异口同声答道：“红军”。这位督学不禁楞了一下，很快掩饰着说：“对，是空军”。事后还托人转告王桂五，“不要弄得太红了”。王桂五同志所以能在白区较好地开展工作，主要是坚定而又联系实际地执行党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统战方针，善于利用当地上层人物之间的矛盾，同时他刻苦钻研教学，在教育界享有盛名，有些人出于爱才心理也给了不少方便。因此，巩县地下党组织在国民党发动的几次反共高潮中，没有遭到大的破坏。

“遗爱”学潮

王桂五经上级党委批准，放弃了月薪26元的优厚待遇，离

开秉礼学校的教师岗位，成为每月拿6元补贴的“职业革命者”，但没有固定住所。同年秋，县委组织委员徐宝森同志设法在孝义镇小街上借用一间房，作为县委的地下机关。门口挂了个“新中派报社”的牌子，他和秉礼学校发展的学生党员李景文同志住在里面。李担任县委交通员，兼管秘密分送《新华日报》。

这座洛河岸边的孝义小镇，在中国近代兵工史上很有名气，清末洋务派（民国4年北洋军阀袁世凯）筹建的“巩县兵工厂”就建在这个镇上。1928年，中共已在该厂开展工运工作了，曾发动过罢工运动，刘少奇同志还在党刊上撰文总结该厂罢工的经验教训。蒋介石两次视察该厂，并将这个厂生产的步枪命名为“中正式”。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同年11月巩县兵工厂南迁。在空荡偌大的厂址上，1938年冬，成立了遗爱中学。意在工厂给巩县乡亲留下的一片爱心。

王桂五同志在秉礼学校发展的党员孙应瑞，小学毕业后考入遗爱中学，党的活动就在“遗爱”的进步学生中展开了。先是传阅进步书刊，如《斯大林传》、《世界知识》、《读书月报》等等。这期间日本侵华军以兵工厂为目标，不断派飞机投弹，用大炮隔黄河远射，狂轰滥炸兵工厂旧址，有的学生因而被炸死，更加激发了学生的愤怒。校方的训导主任、国民党骨干分子为配合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不许学生三三两两集会，还搞了一整套背书和体罚的制度，连代数公式都要强制学生背诵。妄图以此扑灭正在学生中兴起的抗日怒火，更是火上浇油。在这种背景下，以打击国民党反共气焰，扩大抗日宣传为目的的罢课斗争，在县委的领导下开始了。罢课斗争的骨干，都是初中二年级的学生，国难当头，促使这些少年政治早熟，加之党的领导，罢课斗争便有组织、有步骤、有策略地发动起来了。他

们不空喊过激的政治口号，而是揭露校方光图赚钱，聘用水平差的教师，不求教学质量，误人子弟；反对克扣学生伙食费和强制背书及体罚。其次，在组织动员方面，尽量广泛发动各种政治表现的学生，争取普遍的同情和支持，对埋头死读书的高材生，也要使他们保持中立。于是，骨干分子分头发动，有的乘当时校内盛行的结拜“金兰”之风，在同学中拜把兄弟联络感情；有的以组织篮球队打球联络爱玩不爱学习的公子哥儿。很快，罢课的时机就酝酿成熟了。那是1940年4月的一个星期五上午，二年级甲班中代数考试的课堂上，考试刚进行15分钟，按事先约定的信号，一位同学突然跺了一下脚，其余学生便纷纷离座向老师交上白卷。闻讯气势汹汹赶来的校长想压制住学生，不想被学生们顶了回去，立即引发了全校的罢课。

第二天，学生代表要求和校长谈判，校长躲着不见。一怒之下，一个叫孟宪廷的同学，率领学生组织的纠察队，闯进校长宿舍，把校长的老婆轰了出来，还把她的被子面扯下来，升到旗杆顶上……尽管他们的行动未免幼稚，可他们还是一群孩子呀，作为领导核心的那个党员刚18岁，最小的活跃分子只有14岁。他们敢于斗争就难能可贵了。学潮收到了打击反动势力，鼓舞抗日斗志的预期效果。此后，强制背书和体罚的制度废除了，限制学生议论国事的规定也不敢公开提了，进步学生创办了大型壁报《烽火周刊》，宣传抗日救国、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批判“读书救国”、“勿谈国事”等谬论。罢课斗争中的骨干分子先后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壮大了党的队伍。

人小志大

遗爱中学的学潮虽不算十分成功，但影响不小，连小学校都波及了。这和王桂五深入讲学有直接关系。当时有洛河的西

岸，相传是东周周惠公少子班封地的古城堡下，大坡沟口有个民办的私立小学校，叫坡沟小学，名字虽不雅，却闪烁着星星之火。这个学校仅有一个教员，轮流给三孔土窑洞内不同年级的学生上课。教员是中共党员焦瑞甫。因此，县委书记王桂五有时也到这里给年纪稍大点的学生讲抗战时事，给小的讲革命故事。王桂五总是穿件平纹布长衫，举止文雅，谈吐风趣，孩子们很欢迎他，尊称他“王先（儿）”，即王先生的儿化音。王先（儿）在孩子们的心中，既亲昵又神秘，甚至有点偶像感。他们总爱说：“听王先（儿）的！”

时间不长，国民党的“警犬”很快嗅出坡沟小学的政治气味，县教育局以赤化为名查封学校赶走教师，又派一个姓康的三青团员任教师。大一点的学生便组织起来，决心把反动教师赶走。一天四年级上语文课时，13岁的康新义同学拿出文言文“尺牍”（撰写公文、家书的范文集）课本，向新来的老师提问，那个三青团员本来就是草包，又没有思想准备，讲得驴唇不对马嘴，学生大哗，他便恼羞成怒，讲脏话辱骂学生。于是，十几个大一点的学生说他没资格当老师，当即给赶出教室。没有老师上课，高年级的学生就带领低年级的学生自习，秩序井然，坚持了一个多月，从而锻炼了孩子们的自治能力。

（二）延河情长

巍巍宝塔山，悠悠延河水，造就一代中华英才。延安的小米，给王桂五无限的智慧的力量……

小米管饱

1941年皖南事变后，中央为保护干部，把国民党统治区我党的地下干部分批调回延安。王桂五和登封县委书记首批奉调。二人化装成卖文具的货郎结伴上路，披星戴月，风餐露宿，经

过好多天的周折，这天来到陕西耀县，在陕甘边区与国统区交界的一所小学校里，被国民党特务拦住，百般盘问，纠缠了足足半天，没有发现破绽，才放他们走。二人匆匆赶路，翻过一道深沟，又渴又饿，巧遇一家老乡，正端着粗瓷大碗在大门口吃午饭，只见满碗是被辣椒染红的面条，使河南人望而生畏，他们搭讪着上前讨要煮面条的汤喝，顺便探问距边区还有多远，老乡答已经进入边区，向前20里到了柳林镇就见到八路军了。两人闻听喜上眉梢，饥渴全消，脚下生风，直奔柳林镇，不料柳林中迎接他们的却是牛皮绳。原来当地的民兵误认他们是国民党探子，不由分说就用牛皮绳把他们五花大绑牢牢捆住，把手都勒肿了，直接关进柳林禁闭室里。后来见到当地驻军的营首长，说明情况，才知道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笑了之。离开柳林又经700里跋涉，终于到了圣地延安，住进中央组织部招待所的当天下午，就遇见了当时任组织部长的陈云同志。陈云亲切地问他们从哪里来，还诙谐地说：“来到延安别的没有，小米管够吃”。

心系难民

1942年底，王桂五同志被派到边区的同（官）、宜（君）、耀（县）办事处任民政教育科长。主要是安置边区的伤残红军和逃荒来边区的难民，当时敌人对边区全面封锁，生产、生活条件都很差，这两项工作就更难做，民政教育科门前经常挤满要求安置的人们。有一天一户难民对安置工作不理解，一家三口不辞而别了。此事被当地的专员知道后，大发雷霆，质问民教科科长是干什么吃的？要求立即把这户难民追回来。王桂五同志没有强调客观原因，也没有为自己开脱责任，他背上粮食和镢头，“萧何追韩信”一样，连明扯夜边寻边追。后来遇到一支队伍，

战士们提供了那家难民的去向，终于追上那一家人。王桂五的把粮食和镢头代表政府赠送给他们，并耐心讲解了边区开荒前三年不收税，三年后少收一些的優惠政策，妥善安置了这户难民。

拜访织布劳模

参加整风审干以后，1944年王桂五跟随行政学院和延安大学合并后组织的群众工作委员会，到当时延安的商业区——新市场任文书。这期间英国记者斯坦因到延安采访，王桂五以基层干部的身份接待国际友人，并陪同斯坦因访问了新市场辖区的织布模范石来成，事后又将石来成的事迹在解放日报上进行了报道，从此二人结下深厚的革命情谊。1990年冬，王桂五同志重回延安，携夫人专程拜访石来成，可惜老模范已经作古。他不顾年事已高，几经周折，找到石的孙子，深情地追忆往事、鼓励晚辈向他爷爷学习，为建设老区贡献力量。

两块月饼

桂五同志一生廉洁，在认识他的人中是有口皆碑的。1944年的中秋节到了。延河的水和清凉山的风因整风审干扩大化错误得到纠偏，也显得更加清澈凉爽了，一个个被摘去大小“帽子”的人们，愉快地欢度着团圆节。昔日在遗爱中学闹学潮的那位小将，虽然经受了“审干”的洗礼，政治上成熟多了，但毕竟还是个刚刚18岁的小青年。他得知老领导、老战友王桂五在新市场乡当干部，如同80年代初人们向往深圳一样，不过他没有去抱“金娃娃”的奢想和兴趣，只是想去吃多吃几块月饼，打打牙祭。于是，便邀上洛宁县的原县委书记老魏去“吃大户”。不料桂五并没有利用工作上的便利条件特殊招待他们，而是自己掏腰包，拿出3元边币，让他们到市场上买了两块月饼吃。半

个世纪过去了，当年那位没能吃成大户的老同志提起此事来，仍然十分钦佩。50年代，有位老同志来京治病住在他家，有天傍晚二人到附近一家小影院看末轮电影片消遣，排队买票的人多，那位同志挤到前边请人代买两张，他很感不妥，极力阻止，怕影响不好。桂五同志就是这样严于律己的。

（三）山高林密

1942年5月，中共河南省委决定派王桂五等5位同志以“政治传达员”身份，回河南敌占区传达党中央的白区工作方针；整顿党的组织；撤退党的干部。他分管传达的陕县、卢氏、栾川等几个县，山高林密，政治情况复杂，曾几番遇到险情……

误入敌炮兵阵地

王桂五由陕西马兰镇出发，进入河南省境内，经过灵宝县来到陕县。陕县是潼关的前沿，面对日军西进的态势，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国民党军队在此严密布防。王桂五腰缠5千元地下活动经费，肩负政治传达员重任，唯恐发生纰漏，专挑崎岖小道穿行，不料正是小道把他引进危险的去处——国民党军队的炮兵阵地，敌兵蜂拥而上，把他围了起来，厉声盘问，还要搜身。桂五同志心想，如果敌人搜出身上带的钱，就一口咬定自己是烟土贩子，否则那么多钱说不出用向更要引起敌人怀疑。这样顶多按贩烟毒关我几年，只要不暴露党的机密，个人安危无所谓。但口头上他却沉着地回答盘问：“我是教员，去辛庄找邸新民”。邸新民的父亲恰在这时背着粪筐拾粪路过此处，证明二人相识，确实经常到他家找他儿子。没等敌兵搜身，就央求“长官、老总”给放行了，总算闯过第一关。

请“土匪”掩护

豫西的卢氏，栾川等县山高林密，民风纯朴而强悍，地方武装活跃。清末民初“绿林”遍地，河南军阀刘镇华就是在这一带组织“镇嵩军”的。抗战伊始，各派政治势力争夺武装力量，鱼龙混杂。桂五同志刚与卢氏县委书记在一家小饭馆接上头，小县城市面上就炸了营，伴着枪声、吆喝声，但见行人乱跑，城门迅速关闭。桂五他们以为敌人发现其行踪了，立即转移到人称“土匪”的同志家中，决定利用该同志的两支驳壳手枪，坚持到天黑，再冲出包围。后来才弄清是县衙里跑了犯人，关城门捉犯人引起的全城躁动。虽说是虚惊，但反映当时我党地下活动的险恶处境。

果然，当他来到栾川县，就听说一位姓张的党员被捕了，敌人要把那位同志押往卢氏县，他们便组织3个同志携带武器到路上拦截，因敌方出动20多人武装押解，没有营救成功。50年后桂五病危住院期间，还念叨“那位同志后来不知脱险没有？”

“我想给她立传”

王桂五同志回豫西检查工作期间，国民党反动派正在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国民党第一战区的特务组织“伏牛山锄奸工作团”，在豫西各县活动猖獗，破坏我地下党组织，追捕我地下党员和进步爱国人士。灵宝县有个党员就被吓得不敢向王桂五承认是党员了。栾川县有个党员也叛变了。桂五同志深感对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对那些斗志不坚定的可怜虫，尤为鄙视。正当这时他听到宋清芬同志牺牲的凶信。宋清芬以平凡而悲壮的事迹使党旗更为鲜艳，给处于危机四伏的王桂五以力量。桂五同志弥留之际还说：“我现在精神不行了，否则我想给她立个传，这是一位好同志。”宋清芬是1938年中共巩县县委

发展的第一批女党员之一。她的家乡与诗圣杜甫的诞生地毗邻，山青水秀，向北便是洛河入黄河的阙口，相传是大禹治水时劈开的。宋家在当地称得上名门大户。可是清芬却很不幸，她年纪轻轻就守寡，与一个残疾孩子相依为命，在娘家寄居。全民抗战的爱国呼声，引导她走出深宅大院，投入民族救亡斗争，并且成为一名坚强的共产党员。为了地下斗争的需要，桂五同志派她先后到登封县和密县，与这两个县的中共县委书记扮成假夫妻，她不讲价钱，不计荣辱，很好地完成了掩护任务。后来她又被调到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也是踏踏实实，任劳任怨的。后不幸被捕，惨遭杀害。如同野兽般的伪军把她的尸体扔到洛河滩，喂了野狗！

（四）为民作主

1945年初，王桂五回豫西开展敌后抗日工作，任巩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豫西早已流传着一首民谣：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须知惨遭水、旱、蝗、汤四害洗劫的豫西，连红薯都没得可卖呀！要认真真给家乡父老办几件实事是很不容易的。既要维护贫苦农民的切身利益，又要符合统一战线政策。这期间王桂五进一步发挥了他善于调查总结的长处，每项工作除了总的政策、方针外，他都能因地制宜地制定具体措施，在区别对待中体现政策，收到良好效果。

“倒地”

“倒地”是豫西民主政权的一项特殊工作。是指贫苦农民赎回在1941年至1942年的灾荒期间，忍痛低价卖给富裕农民的血汗土地。灾年过后，民主政府为民作主，发动卖主以原价赎回卖出的土地。这是关系广大农民命根子的大事，也是深得民心的一件好事，但执行起来就涉及到方方面面，政策性极强。桂

五同志经过深入调查，本着团结大多数农民、孤立打击个别顽固户的精神，亲自制定巩县倒地的实施方针：对有恶迹抵制倒地的富户要强制倒回土地，必要时要发动群众组织说理斗争；对同意倒回土地的，只需通过司法部门办个手续，不要搞群众斗争，扩大打击面；对富裕户，要尽可能减少他们的经济损失，比如等收完庄稼再把空地倒回去。如此合情合理区别对待，使得“倒地运动”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为尔后征公粮、扩军都打下了基础。

反 霸

反霸斗争是发动群众，巩固抗日根据地的重要一环。王桂五同志十分重视反霸斗争的策略，反对蛮干，反对单纯“出气”报仇，即使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恶霸，也要讲清要杀的理由。巩县四区车元村有个恶霸叫贺金炳，依仗与伪保安队头子是“把兄弟”的关系，鱼肉乡里，无恶不作。村里人娶媳妇，他先行“初夜权”，群众敢怒不敢言。县政府决定搬掉这块大石头，在车元村召开千人公审处决大会，王桂五县长在会上讲话，指出贺的罪行第一是当汉奸，勾结日伪军，暗中给敌人送枪支弹药。第二是欺压百姓，糟蹋妇女为害一方。对于那些有过罪行只要拥护抗日，改邪归正不再欺压百姓的，抗日民主政府就团结他们。把贺金炳当场处决后，群众拍手称快，素有劣迹者受到了教育但并不绝望，效果很好。

锄 奸

1945年5月，豫西抗日先遣支队三团，在巩县、汜水县交界处一举歼灭了伪军王乐三等部，打了个漂亮仗。日军旋即纠集巩县、汜水、荥阳三县的伪军向三团及抗日嵩山行署所在地偷袭报复，三团又将计就计，伏击敌人偷袭再次得胜（即琉璃